

马海德：第一位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 孙国林

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是访问陕北和延安的第一位高端人才。一切为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充满希望的边区，强烈地吸引他留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在延安，他很快“革命化”“中国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边区的医疗卫生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担任中央卫生部门的要职，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忘我地工作着，直至生命的终结。马海德在中国的成长和贡献，是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开放、引进人才方针的成功范例。

怀抱理想来中国

1910年9月26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孩。父亲给他取名为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在中国鼎鼎大名的马海德。

1934年，乔治结识了宋庆龄。从她那里，他知道了中国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他参加了由侨居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1936年春，中共中央从陕北辗转给上海的地下党发来信函，指示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访问陕北苏区，并把他的见闻告诉全世界；还要邀请一位“训练有素的西医”，来帮助陕北苏区创建医疗事业。一天晚上，宋庆龄将乔治请到家中，转告了这一邀请，并为其安全进入陕北苏区作了精心周到的安排。乔治喜出望外，立即做好准备，等待上路。当时计划访问完即返回上海。这一邀请，是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对外开放的信号。

1936年6月，乔治避开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视线，在西安与来自北平的埃德加·斯诺秘密会合。1936年7月14日，保安隆重举行欢迎斯诺、乔治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热烈欢迎第一批到访的外国人。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欢迎乔治大夫来苏区工作！”7月16日，他们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

切接见。经过一段时间访问后，党中央派伍修权担任翻译，陪同斯诺和乔治到宁夏豫旺堡考察访问。在豫旺堡期间，乔治了解到回族群众中姓马的人很多，宁夏还有一句俗语：“十个回回九个马，一个不姓马就姓哈。”乔治为了表达永远同回族兄弟、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心愿，决定也姓马，将自己的原名乔治·海德姆改为马海德。4个月过后，当斯诺完成采访任务离开边区时，马海德却改变了原来“访问后返回上海”的计划。他对斯诺说：“这里的医院和群众、病人都需要我。我决定留在陕北工作，要为中国革命事业作一些贡献。”这一决定，使马海德的人生轨迹步入一条崭新的革命大道。

宝塔山下的万能博士

1937年1月，马海德背着宋庆龄送给他的医药箱，随部队进入陕北的延安。他以满腔热情一边紧张地投入诊疗工作，一边进行调查研究。1937年2月，马海德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说：“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极大地愉快。”

在延安，马海德很快学会了当地语言，无论是八路军战士还是当地老百姓，都愿意找这位大鼻子的“马大夫”看病。因为医生少，他几乎成了全科大夫。此外，还经常有人找他修理手表、眼镜、钢笔、打火机 etc，他一律热情帮助，简直成了宝塔山下的万能博士。在延安，马海德除了担任卫生部顾问这一重要职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健康。马海德尽心尽力的完成这一任务，也由此与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养成了夜里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马海德从医学角度，帮助毛泽东调好生物钟，以保证他完成对全国抗战的指导工作。他经常邀毛泽东进行各种体育活活动，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轻微风湿性关节炎后，就开始陪他散步。在延安，周恩来有一次骑马时不慎跌落马下，摔断了右臂。马海德立即组织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华、柯棣华等著名医生进行会诊。

马海德全身心地投入中国革

命，做了许多超出医学范围的工作。马海德在延安期间，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经常接待访问延安的国际友人，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1937年11月，他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他还经常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1946年马海德还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有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在这里，他名义上是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实际上是为英语翻译的备忘录在文字上把关。不久，他又作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医疗顾问，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的人员进行接触，积极争取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

“洋女婿”变成“中国女婿”

令马海德高兴的是，他在延安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与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生周苏菲结为终身伴侣。说来这段姻缘也是缘分。1939年冬，周苏菲伤风鼻塞，长期不愈，她便到延安城内的医院治疗。那天，接诊的恰巧是洋医生马海德，马医生态度非常认真、热情。周苏菲看完病，心怀美好的印象离去，马海德也被这位病人的东方女性美深深打动。第二天，他写了一张便条，托人带给周苏菲：希望她按时吃药，早日康复。周苏菲心里热乎乎的。当时延安每逢周末，许多单位都举行舞会，各方人士可以自由参加。坐落在延安城东10里处的桥儿沟的鲁艺，利用一座旧天主教堂作舞厅，地面平滑，且有像样的乐队伴奏，是延安最好的跳舞场所之一。自从给周苏菲看病后，马海德经常骑马去那里参加周末舞会，并主动邀请周苏菲跳舞。当周苏菲说不会跳时，马海德自愿当起了教练。一来二往，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终于，两个月后的1940年3月3日，30岁的马海德与21岁的周苏菲，牵手来到中央组织部申请结婚。得到批准后，他们又到边区政府正式登记，领到结婚证书。马海德高兴地说：“这是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结婚证是在一张纸上分左右两联，本应裁开，男女双方各执一联。但马海德坚决不让撕开，说：“我们一辈子也不分开。”

领到结婚证后，马海德当即给好友路易·艾黎打电话，说：“好朋友，我结婚了，请寄200美元。”收到钱后，马海德在城内的饭馆摆了10桌宴请宾客，每桌10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应邀出席祝贺。1943年，他们的儿子降生，取名幼马，随母姓周。这桩跨国婚姻，幸福美满，令人艳羡。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又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早在1937年在延安时，他就曾向周恩来提出要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无奈地对他说：老马啊，我们哪有国籍呀？我们只有个党。等将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就第一个批准你加入中国国籍。此时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兑现承诺，高兴地批准马海德的中国国籍。他成为第一位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不久，毛泽东在香山邀请马海德一家做客，对这个“洋女婿”变成“中国女婿”表示祝贺。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1953年，在他的提议下，中国皮肤病病研究所成立，他受命担任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卫生部专家局成立后，要给外国专家包括马海德涨工资。马海德却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断然拒绝涨工资。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政协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9月，国家卫生部授予马海德“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光荣称号。

1978年，马海德在阔别故乡45年后，回到美国与家人相见。也是这一年，马海德身患癌症，先后做过8次手术。但他并没有停下在中国治疗麻风病的计划，毅然到病区看望麻风病人，与他们握手交谈。

1988年5月，马海德出院刚3天，就飞往加拿大落实麻风病防治基金。他自己为基金会捐资10万美金。同年10月13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医学家、社会活动家、人民外交家、人道主义战士马海德逝世。夫人周苏菲把丈夫留给她的养老的4万美元捐出来，成立马海德基金会，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推动麻风病防治工作。遵照马海德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留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份由周苏菲送回美国，葬入家族墓地；另一份，撒入他在中国辉煌人生起步的地方——延安的延河。

（摘自2012年第6期《党史博采》，原标题为《马海德：“革命化”“中国化”的美国医学博士》）

路易·艾黎打电话，说：“好朋友，我结婚了，请寄200美元。”收到钱后，马海德在城内的饭馆摆了10桌宴请宾客，每桌10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应邀出席祝贺。1943年，他们的儿子降生，取名幼马，随母姓周。这桩跨国婚姻，幸福美满，令人艳羡。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又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早在1937年在延安时，他就曾向周恩来提出要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无奈地对他说：老马啊，我们哪有国籍呀？我们只有个党。等将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就第一个批准你加入中国国籍。此时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兑现承诺，高兴地批准马海德的中国国籍。他成为第一位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不久，毛泽东在香山邀请马海德一家做客，对这个“洋女婿”变成“中国女婿”表示祝贺。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1953年，在他的提议下，中国皮肤病病研究所成立，他受命担任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卫生部专家局成立后，要给外国专家包括马海德涨工资。马海德却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断然拒绝涨工资。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政协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9月，国家卫生部授予马海德“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光荣称号。

1978年，马海德在阔别故乡45年后，回到美国与家人相见。也是这一年，马海德身患癌症，先后做过8次手术。但他并没有停下在中国治疗麻风病的计划，毅然到病区看望麻风病人，与他们握手交谈。

1988年5月，马海德出院刚3天，就飞往加拿大落实麻风病防治基金。他自己为基金会捐资10万美金。同年10月13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医学家、社会活动家、人民外交家、人道主义战士马海德逝世。夫人周苏菲把丈夫留给她的养老的4万美元捐出来，成立马海德基金会，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推动麻风病防治工作。遵照马海德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留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份由周苏菲送回美国，葬入家族墓地；另一份，撒入他在中国辉煌人生起步的地方——延安的延河。

（摘自2012年第6期《党史博采》，原标题为《马海德：“革命化”“中国化”的美国医学博士》）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方案最终确定。国庆一周年纪念日，有关部门临时赶制了一枚木质国徽，而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器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前身）。

接到任务后，沈阳第一机器厂立马成立攻坚小组，28岁刚刚入党的吴嘉祐有幸加入其中。

当时，第一机器厂刚恢复生产，铸造技术虽稍有名气，但工具设备简陋。车间用勺炉生产简单配件，从模具制作到浇铸成型全凭经验，要铸造国徽这样的高精度铸件，很有难度。

“铸造国徽的第一道工序是做模型，直接关系到铸件质量。但当时厂里没有铜铝合金铸造工艺。为了保证铸件的花纹饱满清晰，厂子特地从内蒙古和大连运来砂子，内蒙古砂细有黏性，大连砂粗无黏性，两种砂子混合打铸型，能保证国徽表面光洁度。”

吴嘉祐介绍，国徽质地为铜铝合金，然而两种金属熔点相差较大，因此浇铸火候时机不易掌握。“工人们经过反复试验，采取局部浇水、加速冷却的方法，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

吴嘉祐当时负责第二道工序——精加工抛光。这道工序还被细分为五步：清理、修补、精雕细琢、刮平、抛光。“我们用钢丝刷将国徽毛坯凹凸不平处打磨干净，再用小刀将国徽图案雕刻出来，刮刀刮平后整体抛光，这样国徽就如镜面般光亮。”

在此期间，沈阳第一机器厂的车间内彻夜灯火通明，工人白天黑夜连轴转。没有炉子，工人们砌了个砖炉；没

林伯渠开荒种地

□ 吴学军

从1937年到1948年，林伯渠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用了极大的精力去抓生产。

1942年底和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林伯渠不仅领导边区生产，更以实际行动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之一。虽然工作繁忙，他还是挤出时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每天工作后，他总是扛着农具前往他开垦的土地，在那里种上谷物和蔬菜，并持续锄草、施肥、浇水，做到精细管理。有个农民见林伯渠经常在大清早提着箩筐拣粪，非常感动，就领着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林老的粪堆上。林伯渠见到后表示感谢，但拒绝了农民父子的好意。1944年，林伯渠还亲自拟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主要内容是：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

第一枚金属国徽

□ 刘洪超

有化铝罐，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剂，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在炉前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

1951年4月，沈阳第一机器厂提前20天成功铸造出10多枚不同型号的国徽，其中直径2米的大型国徽于1951年5月1日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摘自2019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抗日战争中的沂蒙人

□ 王凤青

英勇顽强的沂蒙人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寇对国共两党的战略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对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则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在此情形下，作为中共领导的重要的敌后战场一旦战略地理位置特别重要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日寇的频繁扫荡。沂蒙地区作为中共山东省委所在地，则成为日寇扫荡的重点地区。面对日寇的扫荡，沂蒙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与之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41年10月，日本集中万余人对沂河地区中心根据地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分区清剿”等战术，疯狂反复进行扫荡，并在中心地区垛庄、层山、涌泉等村镇设立多处据点，逼迫村民说出八路军的下落，村民表现出了与日势不两立的顽强精神。11月17日《大众日报》中《“剿死咱也是不知道”》一文报道了一个年迈老人的不屈表现。某村庄遭日寇扫荡，村民都躲到了山沟里，只剩下了几个年迈的老人。鬼子什么也没发现，就把一个年迈的老人绑起来，企图从他身上获得八路军的消息。然而，老人的回答却是“不知道”。鬼子恼羞成怒，把老人拉到切草的铡刀旁边威胁道，如果不说就铡了他。老人镇静地回答：“不知道就不知道。”鬼子不甘心，把老人像干草一样放在铁侧上，锋利的铡刀朝向他的肚皮，威胁道：“不说就铡死你！”但老人丝毫没有动摇，依旧回答说：“不知道，铡死我也不知道！”后来，鬼子

反复逼问，老人依然没有说出八路军的消息。

1943年下半年，日伪军万余人对鲁南山区进行大扫荡，并在白彦、埠阳、九女山、白山等村镇安设了据点，沂蒙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10月13日《大众日报》中《一年来的垛庄包围战》一文记载了敌人到达垛庄时沂蒙人民的英勇表现：“当敌伪一千多人浩浩荡荡进入垛庄的时候，偌大的庄子里只剩了十一个人——三个战前的邮务人员，两个长大麻风的，还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和老太婆。房子里，连一个碗也没有留下，这是垛庄人民给敌伪的第一个回答。”“更使敌人头痛的，每次出动都被山头上和树林里飞来的枪弹打得抱头窜回据点，一百多伪军到横山后抢粮，空军被迫到围子根。二百多敌伪往青驼据点取（去）联络，又被打死鬼子一名，汉奸三名。除此以往（外），两个月内他们没走出垛庄五里路。”

机智灵活的沂蒙人

面对日寇的野蛮暴行，沂蒙人民在不惧敌人、英勇顽强抗战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机智灵活、讲究策略的一面。他们在凶悍的敌人面前，没有慌张，没有蛮干，而是沉着冷静，随机应变，想方设法消灭敌人。

1940年10月，日寇扫荡郯城、邳县等根据地，占领了郯城、码头、重坊等城镇，设立据点。这些地区的民众为了抗击日寇，创造了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1941年2月7日《大众日报》中《临郯费峰四县边联的工人是在怎样斗争着的》一文记载了沂蒙人

民反击日寇的四种方式。一是破坏敌人的电话线。“他们每个人都兴奋地拿着斧头、镰子”，向敌人架有电话线的据点出发，一夜之间，“十二里路的电线杆完全被砍断了，电线也被砍断了”。二是拆桥。临邑七区沿庄南的大石桥，是到敌人据点陈家桥的必经之路，敌人经常桥上来来去去。临近村庄的20多个石匠“自告奋勇去拆桥”，“结果一座坚固的石桥被他们的力量摧毁了”。三是毁围子墙和炮楼。四是夜袭敌人据点。沂蒙人民与自卫武装积极配合，在一个晚上，“捣毁了吴丘的围子墙，烧掉了吴丘的汉奸的巢穴”。

同年6月10日《大众日报》中《艰苦斗争中的冀鲁边军民》一文则记载了冀鲁边区军民采取多种方式保卫抗日根据地的事迹。一是破路。“一面敌寇在挖路，一面根据地的人民，协同着自己的武装——冀鲁边的八路军，每天晚上到那里破路。”“每天晚上看到自己的兄弟们来到的时候，便兴奋的（地）扛着铁锹，提着大筐出来协助，这样便把敌寇‘确掌占领区’一番鬼计完全破坏了。”二是创造路条检查制度。“路条查的（得）也很严格，没有路条，不问你是什么人，老太婆、小孩子也会把你送到乡、村公所去或者是乡村小学里，问不清楚的话他们照例是按着他们的组织系统，一层一层的（地）转送上去。”三是放哨。“放哨不但放在村边，而且放在村外的十字路和三岔路口上，假如发生情况（将近四年的斗争经验，使他们善于了解情况），估计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敌人的话，村外的人把绳子一拉，村里的铃一响，

村里就会很快的（地）连一只鸡都见不到。”

纯朴善良的沂蒙人

对于敌人，沂蒙人民表现出的是同仇敌忾、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对于为保卫山东抗日根据地、保卫沂蒙人民生命财产付出巨大牺牲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党员干部，沂蒙人民则表现出了纯朴善良、憨厚正直的一面。

1939年5月下旬，日寇纠集日、伪军2000多人，分三路进犯莒县、沂水，企图打通台潍公路。1940年3月25日的《大众日报》中《鲁南敌遭受空前巨创》一文报道了战争期间沂蒙人民对八路军无私支持的情景。“附近民众除一部参加作战外，余多自动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情报队，终日昼夜帮助军队，抬送伤兵，送茶送饭，侦察敌情，维持后方治安。”百姓都说：“我们应该帮助日本的八路军！”同一天，《大众日报》中的另一篇文章《我们这样战败了敌人的！》也报道了沂蒙人民对八路军无私奉献的情形。“一个年已六十的老人，他也鼓着他仅有的力量，去背负受伤的同志，他自己曾摔了两跤。”“战争正激烈的时候，西高庄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娘，没有离开家，敌人炮弹已打进了他（她）的村，但她仍在辛苦的（地）一个个人烧着两锅茶。有人叫她暂且离开些。她说：‘我走了还行吗？前线的同志们没有茶喝怎么能打仗呢？’”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沂蒙地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开始转入了

局部反攻阶段，战争也逐渐多了起来，党的军队需要的给养也多了起来，沂蒙人民更加支持党的事业。7月3日的《大众日报》中《沂蒙人民和八路军》一文描述了沂蒙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情景。文章写道：“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像一切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一样，养育着成千成万勇敢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八路军和他们是父子，是兄弟，是姊妹。”当缴纳公粮的时候，庄里的老大爷说：“这是给咱自己的孩子吃的，拿要拿好的”；“朱大娘把麦子碾了又碾，七八家子抱着口袋，挤在桌子前，二百户人家，一天就缴完了”。

到1944年前后，沂蒙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但沂蒙人民对八路军依然表现出了无私支持的一面。9月5日的《大众日报》中《我军解放沂水全境》一文报道了沂蒙人民热情欢迎八路军进入沂水县城的景象：沂蒙人民“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支援自己的部队”。“沿途各庄外面，桌上都摆满了茶水。当我军攻城某部路过庄时，老大娘都忙着给战士调凉开水，并亲切的（地）送到战士们的前边。”群众自动发起的劳军运动，“仅一天就送到肥猪三十多口”。

（摘自2019年第4期《春秋》，原标题为《抗战中的沂蒙精神——以〈大众日报〉的报道为例》）

